



草邊書

葉德明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草邊書

姜德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叶圣陶
装帧设计 钱君匋
责任编辑 费淑芬

书 边 草

姜德明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191,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000

统一书号: 10103·245

定价: 0.69元

《书边草》序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之开始成为文学史研究对象，“五四”以还的文学书刊的取得新版本的地位，这两者，大抵都始于三十年代，也就是五四运动十周年前后。一种思想、一篇作品从它化为白纸黑字时开始，就已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历史文献，迟早总要成为人们搜辑、考证、辑逸和探讨、争辩、研究的对象。一般说来，这过程的久暂，要依社会变革的进程而定。在所谓“世变日亟”的情况下，这过程就将缩得很短。例如十年动乱中泛起的“阴谋文艺”和一些代表“作品”、人物，几乎是在它们“方生”之时，就已陷入灭亡的境地了。但它们留下的污迹，则将永远擦洗不掉。无论好心人怎样苦苦劝人们忘记也无效。这就使我们懂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尽量完整地将原始的、真实的材料保存下来，而且作得愈快愈好；同时，就在这基础上一一点一滴地研究起来。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才有可能出现一种真正科学的历史总结。

可惜的是，对这工作的重要性与急迫性，人们认识得还是迟了一些，没有抓紧。几十年来，人们曾经断续做过些工

作，但多半是自发的、缺乏系统的、即兴式的。十年浩劫，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文献毁失沦亡，作者痛遭迫害，许多人死去了。这就给今天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三年以来，许多同志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成果也是可观的。人们懂得，站在废墟上叹气是无用的，也还只有平整场地，打好地基，一砖一瓦地垒起新的建筑来。

总的看来，人们现在进行的主要还是积累材料的工作。这当然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现象。因为，闭上眼睛作“研究”，挥动大棒下“结论”的时代到底已经过去了。

在我的记忆里，新文学史料以历史文献姿态首先出现的，似乎是刘半农所印的《初期白话诗稿》。那是三十年代由北京的星云堂用宣纸大册线装套色景印的，一本不折不扣的“古董书”。买到这本书时，我还在中学里学习，当然不能认识它在文学革命上的重要历史意义，更强烈的感觉倒是它的“好玩”。同时朦胧地悟出，不只古书可以讲版本，新文学出版物也应该有值得珍重的版本在。至少，鲁迅先生的书所一贯保持的毛边本特色，就可以算作与通常的“光边”本大有区别的一种版本书的特征。同时开始积极地收起书来。当时在天津的天祥市场、北平的东安市场这种地方的旧书摊也真使人今天想起也还要为之神往。“五四”以后出版物的初版本、精装本、签名本，都还是可以经常遇到的。有时一本同样的书前后要掉换若干次。遇到初版的、更完整如新的，就贴一点钱用旧有的一本去换了来。记得这中间就有《朝花夕拾》的初版毛边本，扉页上还印着“鲁迅先生

著”字样的，有着《不周山》的《呐喊》；和分订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这种书前后一起收集了有两皮箱，暑假中寄放在学校的宿舍里。后来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一起化为灰烬了。

鲁迅和西谛合印《北平笺谱》的广告和西谛的《访笺杂记》，记得是在寒假回家的车厢里读到的。这书的预约价是十元，当时无论如何也筹不出这样一笔巨款，这事一直使我懊恼了很久。到了五十年代初在上海的旧书坊里又遇到这书时，它们的身价已经涨到与一部明初本不相上下了。

后来回到上海读书。那是抗战初期，在我家附近的一片旧纸店，天天要从徐家汇的土山湾收进大量的旧书报杂志，转手运到造纸厂去。每天我几乎都要花小半天在这里翻检。这时的视野扩大了，不只是书，又收集起期刊来。记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收齐了全部的《小说月报》（从十二卷开始）和《新青年》、《语丝》……。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上海，兴趣逐渐转变，不过遇到新文学书刊的版本，也还是不肯放手。这时得到的记得有东京印的《域外小说集》初二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在南京当记者时还特别跑到金陵刻经处买来了《百喻经》。

讲了许多这一类算不得经验的经验，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这样的收书，正如章学诚所讽刺的，是属于赏鉴家、古董家的那一类，充其量只是为买书而买书，并藉此获得一些愉悦而已。我利用旧《小说月报》找到过唯一的资料是耿济之译《猎人日记》的连载。后来这书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

版，译者因为旧稿散失不全，有两篇是重新译过的。我发现了那原译，并粗略进行过一点比较。如果把这也算做研究，仍然是很可笑的事。

我当然并不因此而难堪。我相信，有不少在研究上取得好成绩的同志，开始时往往也是这样起步的。区别所在只是他们没有就此停止，一直锲而不舍地深入下去而已。

严又陵为译品设立的标准是信、达、雅；更早又有人对历史研究工作者提出过“才、学、识”的要求。我想这标准还是不错的，对文学史工作者也适用。才，当然指的是才能，这中间也应该包括了研究方法和文采；学，指的是知识面，这就要求广博与深入，还有辨析真伪精粗的能力；识，自然是见解了。这是很高的标准。这中间的基础也不能不是学。

这些零碎的感想，是读过《书边草》中部分篇章以后引起的。自然不是说这些文章都已达到了上面的标准。作者的选题往往是很小很具体的，并非鸿篇巨制。但给读者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知识。有些事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或多少知道一点却并不真切，甚至还有误解的。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都不是值得作研究的合适的题目。不过说老实话，有时打开一册书刊，看见许多堂皇的论文题目，耐心读下去，捉了半天迷藏才发现论文要告诉读者的只是几句早已听了千百遍的老话，这时就会理所当然地产生一种上了恶当之感。象这样可怕的“论文”，在这里是没有的。

作者的心是很细的，能从细微的地方发现人们通常易于

忽略的问题。这和作者收集资料的方法也很有关系。譬如，一些过时的政府公报、一折八扣的盗印书、陈年的旧讲义，甚至一张旧书刊广告、一本挽哀录……这种东西在有些人看来是不值一顾的，不必说研究，就连保存的价值也没有。这里的“有些人”我自己也应该包括在内。一些并不罕见的资料，在作者手下经过整理爬梳，分析论证，会出现更新也更为鲜明的意义，使人信服。同时，作者视野的广阔也显示了胸襟的广阔，他没有门户之见，更没有习惯的偏见。只要是新文学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不论大小，也不管是知名的、无名的，属于哪个流派的，以至象姚茫父、乔大壮这样几乎与新文学似乎很少关系的人物，他也注意到并给以尊重。但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在大是大非前面，一些都不含糊。这是使作品有别于一些没有什么意思的笔记的重要特色。

作者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和我是同行。虽然很久以前就已被挤出新闻圈外，但对这干了多年的职业我还是不能没有一点眷恋之情。作为一个同行，读作者的新著，就感到格外有趣，也似乎更易于接近。照我的经验，新闻工作的优点是有机会见得多、见得广。但这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优点。虽有好条件，但视而不见，见而不思的人还是有的。至于新闻工作的缺点，那就很少有人能避得开。作风粗疏，不能深入，很难伏案研究，缜密思考，可能出现一些出色的“杂家”，但极少产生专家。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细密钻研作风特别使我佩服。至于“识”，也就是“见解”，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倒是有可能在长期的历练中成功地取得，但重要

的是正直。古往今来，一切风派、两面派都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也都各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不过这却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在这里，鲁迅正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先生曾经有过多年编辑、记者的工作经验，他那锐利的、所向披靡的解剖、批判旧世界的眼光，不能说和他的记者经验没有一点关系。

前些时在北京，曾经到作者家里去作客。在书房里他打开了书橱、书架，取出多年收集的书刊和一些作家的签名本给我看。这中间有许多我曾经有过、曾经见过或久寻不获的书册，不能不引起我对曾经热爱，但久已疏隔了的事物的情谊。真是“如寻旧梦，如拾堕欢”，使我感到了很不寻常的高兴。同时也在想，作者大概是会搜得更多珍贵的资料，写出更多有趣的文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知识和愉快的吧。我想，这愿望的实现是必然无疑的。

黄 裳

1980年12月17日

目 录

《书边草》序	黄 裳	1
鲁迅的室名		1
鲁迅的序跋文集		4
鲁迅与淑姿女士的《信》		6
鲁迅与梅斐尔德的《你的姊妹》		10
鲁迅和戈庚的《诺亚·诺亚》		22
鲁迅·王正朔·南阳汉画像石		32
鲁迅与民间玩具		41
《痴华鬘》和《百喻经》		44
一本教材		48
蒋径三之死		49
许丹诗挽鲁迅		51
悲愤以终的乔大壮		54
盲诗人的《枯叶杂记》		59
《过去的幽灵及其他》		63
秋明室诗人沈尹默		68
“疑古玄同”的来历		72
一段佚文		76

林庚白的自画像	79
附：《林庚白的自画像》补遗	82
鲁迅与《西游日记》	86
《半农谈影》的短长	90
许寿裳的《上遂顾诗草》	94
《恐怖之夜》	97
韦素园的《黄花集》	101
阮玲玉的悲剧	104
茅盾·鲁迅·《中国的一日》	107
一份公演特刊	111
徐懋庸注《阿Q正传》	113
尘无其人	116
《浮世杂拾》点滴	118
鲁迅和尘无	120
《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	122
从《未厌居习作》谈起	127
叶圣陶的散文	129
《古槐梦遇》	132
《杂拌儿》和《杂拌儿之二》	135
两篇同名的散文	137
朱自清的教训	139
丰子恺的缘缘堂	141
丰子恺和封面画	146
闻一多的封面画	148
钱君匋的封面画	150

书简文学	153
郑振铎的《西行书简》	155
《伏园游记》的特色	157
诗的游记《剑北篇》	159
老舍的幽默	161
一张书刊广告	164
风暴的预言——《山雨》	167
李劫人的短篇小说	170
《包身工》的姐妹篇	173
阿英与《中国新文坛秘录》	176
《周作人书信》及其他	179
《杂文》与《质文》	184
《红酒》小记	188
曹葆华的诗集	191
《不惊人集》的下落	195
闻一多序《三盘鼓》	197
《饥饿》——农村生活的诗集	200
靳以和李满红的《红灯》	202
李广田序《缪弘遗诗》	204
茅盾·巴金·《烽火》	206
悲壮的《战号》	210
《繁辞集》	213
《剑腥集》	216
杨刚的书	219
罗淑的书	222

孟超的杂文集	225
夏衍的杂文随笔集	228
《春寒》	231
夏衍的诗作	235
鲁彦的后期小说	237
陆蠡的散文	240
三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243
延安的《草叶》	247
胡愈之的《少年航空兵》	250
深夜的萤火	254
两本“五四”纪念刊	257
香港《大众文艺丛刊》	261
吴晗和《自由文丛》	263
仓夷的《幸福》	267
王统照的《鹤华小集》	269
海外的启示	271
姚茫父的《五言飞鸟集》	273
姚茫父诗悼刘和珍	275
《萼海花》及其他	278
壮哉王五	280
石评梅和她的《偶然草》	283
心海里的《涛语》	288
从《象牙戒指》看石评梅	292
鲁迅·刘和珍·石评梅	296
后 记	299

鲁迅的室名

室名堂号之类，是文人们一向所喜欢用的。“五四”以后，此风不衰，现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一些为世人熟知的名号。比如俞平伯的“古槐书屋”，沈尹默的“秋明室”，丰子恺的“缘缘堂”，叶圣陶的“未厌居”，胡适的“藏晖室”，周作人的“苦雨斋”。讲起这些室名来总会有一点来龙去脉，未必同作家的思想完全无关。

鲁迅用过室名堂号没有？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不经常用就是了。

鲁迅曾经请画家陈师曾刻过一块图章“俟堂”，自称是受了陈师曾“槐堂”的启示。而许寿裳却告诉我们，这名号有讽刺教育部当局的意思，因为某长官想排挤鲁迅，他则表示“君子居易以俟命”，且看上司怎样动作。他还把搜集来的拓片编成一册《俟堂专文杂集》。这说明，鲁迅不是为了风雅而用名号的。

一九二四年五月，鲁迅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他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写完《一个“罪犯”的自述》之后，书明：“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这里透露了他想到了室

名的事。果然，过了二十天，在四月二十七日他写完《来信》之后，便标明：“于灰棚。”所谓“灰棚”即指“老虎尾巴”，因为这种灰棚平顶，盖起来要比正式房屋节省一半的钱。“灰棚”只能显示平民生活的俭朴，似乎还不含寓更深的意义，也不能说是室名。到了这一年的年底，鲁迅编完《华盖集》写《题记》的时候正式用了“绿林书屋”。他是这样写的：“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一九二六年校毕本书时又说：“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这个室名具有很强烈的讽刺性，因为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开罪了“正人君子”们，为此得了“学匪”的称号。鲁迅以为这绰号藏有杀机和“可死之道”。“学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名“绿林书屋”。在《两地书》中，鲁迅戏谑地说过，逼得紧了真的要去当“土匪”了！不过鲁迅又说：“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统治者和人民对于“匪”的概念向来是不一致的。

到了上海以后，鲁迅往往在文尾写着“记于闸北寓楼”、“记于沪北小阁”，似乎还说不上是室名，但是，一旦用了“记于上海之桌面书斋”、“记于上海之且介亭”便大有讲究了。桌面之大竟可以成为书斋真是小矣哉！我以为从读者眼中看来，正是又小又大，桌面是小的，从这里发出的议论，其意义却大得很哩。至于“且介亭”还用来作为书名，如《且介亭杂文》便是。“且介”为“租界”之半，“亭”乃亭子间，鲁迅所居之大陆新村正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之筑

路区域，近于半租界。在这以前，鲁迅在《〈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识》末尾用过“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这里含有讽刺之意，因为曾经有位文学家挖苦鲁迅住的离租界近是为了有危险时逃跑方便。可见有些对手也实在无聊，连鲁迅的住处都成了攻击的目标。鲁迅启用一些室名哪里有闲情来风雅呵！

又如在《〈肥料〉译后记》文末用“记于西湖之避暑吟诗堂”，这也是一种假托，反语而已。有的虽然未署室名，却也发人联想，如在《〈剪报一班〉拾遗》后写道：“识于上海华界留声机戏和打牌声中的玻璃窗下绍酒坛后。”又如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后写道：“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鲁迅于上海的风雨，啼哭，歌笑声中记。”凡此都可以作为杂文内容的一个部分来看待，颇堪寻味。

总之，鲁迅的室名不是无谓的风雅，他在北京时以“绿林书屋”作为代表，在上海时则以“且介亭”作为代表，都将传为千古美谈。鲁迅当然不是神，但鲁迅终归是鲁迅，他只是利用室名捎带着嘲笑了一下对手，不是比对方若有其事的攻击高明得多了吗？

1980年10月

鲁迅的序跋文集

鲁迅一生为自己的著译，以及为别人的作品写的前言、后记之类，足有二十余万字。读后，一位中国新文化开拓者和播种者的形象，便走进读者的心中。

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劳绩和影响是值得继承和研究的。早在鲁迅在世的时候，王冶秋便注意及此，他一边抄写，一边做好有关资料，并征询鲁迅先生的意见。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鲁迅复信说：“序跋你如果集起来，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鲁迅还答应为他补充一些收集不到的序跋。待序跋编好寄给先生后，鲁迅于七月十一日答复：“事情真有凑巧的，当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时，我已经连文章也无力看了……现在还未能走动，你的稿子只好等秋末再说了。”谁想，未到秋末，先生竟与世长辞。

鲁迅先生逝世后，编者又将这部稿子捐献给先生的家属。一九三七年许广平曾接洽上海联华书局印行，但抗战炮声一响，便无声息。一九四一年八月，许广平不忘这部书稿的命运，又与文化生活出版社陆蠡联系。陆蠡对这本序跋集很感兴趣，并将原稿索去，决定出版。因此编者特地从重庆